

方志记述论丛

解师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92
K29
3
2

方志记述论丛

解师曾 著

BB05.122

陕西人民出版社

B

335547

方志记述论丛

解师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西安市碑林区永宁彩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7.125印张 2插页 150千字

223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851—1/2·148

定价: 3.85元

目 录

自序.....	(1)
---------	-------

新编地方志要自觉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代前言.....	(3)
------------	-------

试论志体撰写要则.....	(20)
---------------	--------

论方志记述的客观性.....	(44)
----------------	--------

论方志记述的实体性.....	(54)
----------------	--------

谈方志记述的明晰度.....	(78)
----------------	--------

谈对方志记述的哲学要求.....	(91)
------------------	--------

论方志表述客观事物发展规律问题.....	(97)
----------------------	--------

论方志记述中对概括的运用.....	(123)
-------------------	--------

方志记述十题.....	(140)
-------------	--------

一、不作空泛浮词

二、不作推测论证

三、勿作多余评论

四、志稿不同于教科书

五、志书不是科技报告

六、志书不同于工作汇报	
七、志笔不可越境而书	
八、提高志书可读性	
九、不能只写机构任务	
十、处理交叉重复	
方志应记述怪异现象.....	(169)
值得嘉许的有益探索.....	(182)
简论发挥方志记述国情的优势.....	(188)
关于方志记述革命老根据地诸问题.....	(197)
革命根据地以专题集中记述为好	
——评《林县志》革命根据地的记述	(213)
后记.....	(221)

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方志论文集。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文章，都是在全国各省地方志刊物上发表过的。内容主要是探讨有关方志撰写一般规律的、属于方志编纂学方面的论文。本来，我不打算编纂这本集子。因为尽管这些文章对于方志撰写规律有所探索，并且形成若干理论性的见解，但总感到还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刻，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而且本想就方志编纂学中的若干分支，结合方志实践再广泛收集点资料，作些系统的研究，写些比较像样的理论专著。可是由于实际工作太忙，一直未能如愿，出书的事也就拖了下来。最近，许多好心的朋友一再责备我耽误了时间，说出书的事已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特别是一位出版界的同志讲，外省方志工作者来人打听，找着来买有关指导方志编纂方面的书。我这本书小册子，虽说只是编纂方志之初学步时的“脚印”，也仅仅只是一家之言，但他们讲，还有些参考作用，我就同意了。如果这本小册子真还能对修志同仁有所裨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编修地方志，既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是当前“两个

文明”建设的需要。由于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新编地方志已经成为国情的载体，成为全面、系统、翔实反映各地地情的资料性科学文献。志书的这一性质，就要求它既要成为具有可作借鉴依据的权威性著述，又要成为对人们产生巨大教育作用的国情教材。也就是说，要求志书要有很高的质量，使之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成为受人赞颂的传世之作。这也就对方志研究和方志理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方志理论工作的任务也就更重了。

这里可以告慰的是，这本小册子的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修志实践中遇到的，并且是志书撰写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虽然没有十分高深的理论系统，但是对于如何按照志体去撰写方志，以及如何注意避免在撰写方志时所犯的一些常见毛病，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这本小册子得以出版，除了对它关心的几个同志外，首先要感谢省内外广大修志同仁的实践经验对我的启示和教育。其次，要衷心感谢我的领导、师长陈元方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我自己只能算是方志战线上的一个新兵，一个愿意奋进不息、不甘落后，但却还是个一无所成的新兵。

作者谨识

1990年8月1日

新编地方志要自觉为 “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代前言

编纂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几乎可以说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地方志的雏形。这在黄帝时代即有记志之官，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最早的志书。秦汉时方志纂修就初具规模。尽管这一点还需要经过科学考证才能说明。但事实上地方志确乎是经过历代的逐步发展，世代相传，延绵不绝，自成一门。现存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书在我国古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补史之缺”，弥补了史书的不足，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十分重视地方志及其编纂工作。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为了掌握情况，了解当地历史，每到一地总要寻找地方志书和其他书刊报章。1929年红军打下江西兴国城，他首先找来《兴国县志》，了解县情。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就提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曾倡导过编修新的地方志。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

本纪》、《华阳国志》。在这次成都会议上，还把《华阳国志》印发给大家。陕西省于1959年曾经作过编写方志的动员，之后，不少县市已经组织人员着手编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未能持续进行。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这就为编修一代新的地方志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编修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社会主义新方志，不单是为了继承祖国文化传统，首先是因为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须。我们现在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编修新的地方志书，把本省、本县(市)的情况，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历史到现状，系统地科学地记述下来，写出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一方之实录”，起到存史、资治、咨询、借鉴、教育的作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当前，新编方志工作已经展开，并且初见成效，有关方志的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许多问题的探讨，也开始为编志人员所重视。本文想着重谈谈，编修新方志，一定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是编好新方志的重要前提和成败关键。不但在成书之后，而且要把整个编纂过程，看作是了解、考察、研究、总结新编方志如何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过程。我们的方志工作人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应当是自觉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尖兵。

从一则轶事说起

我国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到南康任地方官时，当地官吏

士绅备好财礼馈赠，冀求讨取欢心。但朱熹下车伊始不顾这些，却索求方志，被传为历史佳话。但真正认识到方志“经世致用”作用的人并不甚多。清代陕西地方官刘增曾说过，对于方志“而今之有司往往忽焉不讲。盖以簿书期令，禁止征发，日汲汲焉，无须臾之间。又以如此特文人学士用以词习方闻、资博览，而非当务之急者。故郡邑虽旧有志乘，往往听取编残简断、漫漶而不可考”^①。说政务繁忙无片刻闲暇只是托词，而把方志看作是文人学士“习方闻、资博览”的状况怕是普遍的。那时虽强调“方志之书，实关乎政治军事之用，非徒稽考故实、流连风景，仅供一二学士文人探讨讽颂而已”^②，但实际上重视者仍很有限。

康熙年间《中部县志》（黄陵县志）撰修者李暄（苍山）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记载。汉高入关，肖何收图籍，因知四方强弱盈虚之实。丙吉使东曹，考察边郡兵实之有无，故能指挥形胜。不出户庭，瞭若指掌者，图籍之功也。盖居今而知昔，援古以征今，利弊兴革，数十百年之事，非书不辨。”他对方志不免过于夸大，但对方志作用的见解，仍不失为当时的佼佼者。嘉庆《中部县志》支持他的说法，认为方志“实为吏治之大端”，“邑有志，所以验风俗，辨政治，稽古今因革之由，考盛衰得失之故，但使后人得以审时度势，救弊补编，志之所关大矣”。认为志书“关乎民治”，“裨益于政事”，修志“事缓而实急”，主张地方官吏要把志书作为“从政之一助”。清代嘉庆年间陕西布政使温承惠撰文说：“为守令不周知一郡一县之山川险易、户

① 《乾隆西安府志·序》。

② 《续修南郑县志·跋》。

口登耗、土地荒辟、学校举废与夫屯粮盈绌、风俗美恶，则不能因势利导以施政而宜民。为大吏者不能知守令之所知，亦无以因人地之宜以择才而任吏。二者以方志稽之，则不下堂阶而了于指掌，故曰志与政通者也”^①。可以看出，在昏庸的旧官吏阶层中确实也有少数卓有见识的循吏清官是比较重视通过志书了解地情，并注意考察下级官员对实情的“周知”施政宜民而“择才任吏”。当然，方志是有鲜明阶级性的。封建时代的志书是为维护封建道德和秩序、巩固和稳定封建反动统治服务的。但他们如此重视地方志，足见方志对资政的作用。

事实上，真正重视方志的价值，发挥方志的功用，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才会有的。原因在于我们要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认识客观世界。也就是说，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则必须对于当地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要在建设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必须对本地的自然资源、生产设备及现有生产力水平进行全面了解；要掌握客观规律，讲求效益，则必须对本地的开发与兴衰成败有个系统的认识，以免重复旧辙，得不偿失；要兴利除弊，创办新业，也需要对人才资源进行新的开发。由于方志具有“网罗古今，统括万有”^②的特性，会在这些方面发挥出自己的显著作用。因此，新编方志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资料依据的一个重要来源。这项工作做好了，产生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曾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一个县视察，问及该县县长本县

①《嘉庆延安府志·序》。

②何锡爵：《民国宝鸡县志·序》。

名称的由来及他是该县第几任县长，等等，对于这个本是县志中的一般资料性内容的问题，这位县长竟瞠目结舌，答不上来。固然不能由此来判定这个县长的工作好坏，但由此确可以反映出这个县长对本县县情的若明若暗，不甚了了。而我们的地方志，特别是新编方志恰恰可以帮助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掌握当地情况，以便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能更好地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提高领导水平，搞好工作。我们的方志工作人员，应当及时提供有关当地历史和现状的情况资料，帮助领导明全局、晓变迁、知长短、察利弊。真正这样做了，不但会促进领导对地方志的性质、作用、功能的了解，并且由于发挥了地方志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参谋作用而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支持，从而大大促进新编方志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一个根本性的观念

怎样才能编纂出质量高、价值大的新志书，是所有编志人员关注的问题和倾力追求的目标。许多专家学者都不断著文探讨新编方志的价值和质量标准。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在户县召开的八县县志座谈会上提出了新编县志的质量标准包括政治标准、资料标准、体例标准、特色标准、文风标准，要求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科学上要力求反映当代最新科学研究成果，要求编成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新方志。所有这些，无疑都应当在编写中加以遵循。

需要提出的是，应当有一个总的观念：即新编方志要自觉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这应当是整个方志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和它的归宿。从地方志的机构设立、资料征集、篇目草拟、体例安排、编写组织、复核修改直到审查定稿这一系列过程中，除了考虑志书本身的特殊要求之外，主要点应当在于把方志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作为决取舍、定优劣、考价值、作删增的根本依据。对其中各个环节的要求，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的观念，而一部志书总的价值高低，也只能从这一点去衡量。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就把新编方志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是为当前的具体工作服务（尽管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质上包含着整个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一定的中心和重点，但从总的方面看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几乎社会和自然的一切领域都囊括在内。而这一点，也正是方志的特性和长处。也就是说，方志不是在一个方面和某一个阶段可以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而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可能尽自己的力量，提出有关的情况资料和若干建议，从多方面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我们编修地方志，不是只此一遭，而是要世代编修下去。所以这个问题的提出，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长远的历史意义的。

应当说旧志书的一切优良传统我们都应当加以继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经过消化加以吸收以为我用。然而新编方志毕竟是新事物，无法完全考之史籍而求助于“述往古而昭来兹”。新方志由于在总体上涉及地域的广阔性、资料的巨大容量而显示出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但也必须估计到可能由于我们在认识上的偏颇，使一些对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料的忽略疏漏，从而影响到方志作

用的发挥。比如,有些县志未设地理志,在为数不多的有关论述中也是对于川道平原叙之甚详而忽略对山区和偏远地方的考察,而那些地方倒很可能是将来我们开发的重点地区。对于当今世界十分重要的人口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我们有些志书几乎很少涉及。有些新编县志也不设城镇建设的有关篇章,这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去预测未来的一切,但我们应当努力去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注意的所有情况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编纂新的方志时,把眼光放远一点,把思想放开阔一点。以求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于所在地区的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一些翔实的资料和可靠的现实依据。我们从事编志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应当进行顽强而艰苦的努力,不负人民的重托。

提供历史借鉴的迫切性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华夏大地繁衍生息,对于祖国山川的开发和乡土的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在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中,在农林牧副渔、工业生产、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解放后的四十多年中,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了新的经验,对于今后的两个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在“左”的错误思想干扰下,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经验中不少部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真推广。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规律,还远远没有全部了解和掌握。总之,无论是

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还是对环境保护，特别是在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来改造祖国山河的宏伟事业上，比起世界上科学先进国家来说尚有不少的差距。加之在“左”的错误影响下造成的发展生产、人口生育、资源利用上的某些盲目性，常使一些完全可以防止和避免的危害、损失和灾难不断发生，尽管有些教训是沉痛的，也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但却常常由于种种原因，而习惯于旧的作法，以致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加以注意和改善，这些都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四化”建设。这就需要从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主动地加以研究，总结经验，作出必要的记述，作为今后的借鉴。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工作上的某些失误、疏忽和掠夺式生产所造成的灾难和教训，也都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应当在它还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时候，就去纠正和制止它。例如陕西省临潼县渭河以北的地下水水位升高和局部地区淤水问题，已经危及到全县60%以上的耕地，淤水、积水严重的地方，各类农作物倒伏、房屋因水而倒塌、交通阻塞。少数地块已经开始盐碱化。这一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成为该县的首要祸害。这一地区以石川河为界，东部属东方红引水灌区，西部属泾惠灌区。过去一直以为是由灌溉引起的地下水位升高。经县志办同志多方调查，弄清楚原因主要是当初兴修水利设施时，只修灌溉工程，不建排水设施，以致在水多时无法排泄所造成。当地群众反映，在60年代时水利工程师早就提出要修建排水工程，但当时受到批判。以后虽然作了些补救，修修停停，可是工程不配套。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县委领导的重视，正在加以解决。

类似情况，各个县（市）、地区大小都有一些。例

如陕北及关中渭河沿岸一些县的水土流失，陕南和关中一些县植被覆盖面的缩小和森林的破坏，虽然引起了重视，但实际问题并未解决，制度上还有不少漏洞。如柞水县有的生产队规定：社员盖房，可砍伐二百多根树木，每根四角，由于对树的大小粗细不作规定，一些社员就砍伐粗壮的成材树木，向外倒贩。房屋盖成，不但自己不花钱，反而收入数百至数千元不等，以致造成乱伐森林的现象。对此，县志办及时作了反映，已引起了重视。陕西省近年来发生了几次大的洪水，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但是一些植被覆盖面积大的地方却受害甚微。对于安康县的特大洪水，有人说是旷古未有。但经有关方面调查，翻阅旧志，发现在明万历年间就曾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比这次洪水的水位还高出27厘米。这件事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历史上已有过如此大水，为什么对于安康城市建设不早作打算，对洪水不早作预防？安康县志办的同志本着“急用的资料先搜集，迫切的问题先研究”的原则，查阅了两千多年来安康水患情况，编写了《历次洪水纪事年表》，又撰写了关于城堤建筑的历史资料，提供领导参考。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些同志对于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自觉性差，对于提供历史借鉴的迫切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的任务只是编写方志，怕分散精力，把这项工作看作是“份外事”或“额外负担”。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把编写新方志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立起来。编写地方志，要总结历史经验，提供地情，最根本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搞好“四化”。有些历史经验教训，早认识、早预防、早有措施，其收益和作用往往是难以估量的。不能等志书完成之后，再考

虑发挥作用问题。有些事预先防范事半功倍，盲目麻痹则贻害无穷。

为发展生产提供依据和信息

新编方志注意匡正旧志中忽视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弊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化费较大精力、以较多篇幅反映当地生产发展、物产资源、工艺流程、特产名产等情况和经验，这就对发展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资料。有些地方在这个基础上，又对当地生产的现状和资源进行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有关资料和建议，对于当前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扩大再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如紫阳县的板石，是优质建筑材料，自古以来即被当地群众用来架桥、铺路、盖房子。近几年来板石生产已由手工生产逐步发展到机械化生产，不仅满足了当地需要，而且大量出口。根据县志办提供的资料，有关部门还找到了过去很少利用的绿色板石，引起了外商的注意。1981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建筑商和地质专家到紫阳县考察时，有关部门还专门邀请县志办的同志现场作了介绍。县志办的同志在编写《山水志》时，一方面从旧志中查阅本县矿藏，一方面到专业部门请教并查看科学勘探资料，弄清了本县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他们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促进了当地小型手工业的发展，并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过去县上曾在铁佛寺乡投资几十万元开办煤矿，由于地质情况不清而失败，近年来根据县志办提供的资料，只打了几十米，就找到了煤层，每年收入约几十万元，该县近年来发展了两、三